

买办和官僚资本主义与新殖民统治的危机

热烈欢迎参加由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NDFP）与肯尼亚马克思主义共产党（CPMK）联合举办的第四届新殖民地买办与官僚资本主义理论国际会议的全体与会者！我们向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和肯尼亚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致以崇高的革命敬意，感谢他们积极发起并组织了这场意义深远的会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会议选址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这座城市的悠久历史铭刻着世代人民反抗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掠夺的抗争与坚韧。在这里，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仍在为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与社会解放而不懈奋斗。

通过此次会议，我们希望分享对菲律宾官僚资本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的分析，探讨其起源与运作方式，以及它如何压迫菲律宾广大民众。同时，我们也期待与各位与会者的观点展开交流，借鉴彼此的经验，学习他们所采取的反抗策略。

菲律宾官僚资本主义与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历史

菲律宾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状况是殖民侵略、帝国主义统治以及国内统治阶级相互勾结的历史进程所导致的后果。

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始于 16 世纪，持续了三个世纪。起初，西班牙残酷镇压了当地的公有土地制度，并代之以一种土地垄断体系，将大片土地集中到西班牙王室、宗教团体以及当地殖民精英手中。随后，[恩科米塔制度](#)[2]和后来的[阿西恩达制度](#)[3]进一步剥夺了土著居民的土地所有权，使他们沦为租金剥削、强制劳动（“波洛与服务”）及贡赋制度的受害者。

尽管殖民地在 19 世纪开始面向全球资本主义市场进行生产，但这些封建关系依然延续。与此同时，糖、马尼拉麻、烟草及其他农产品的出口量不断攀升。

19 世纪末，菲律宾人民为摆脱封建与殖民统治的压迫、实现民族自由而团结奋斗。受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鼓舞，一场全国性的反殖民、反封建武装起义于 1896 年爆

发。这场起义汇聚了当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初具规模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大家共同怀揣着对政治与经济自由的热切渴望。

1896年菲律宾革命作为一场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成果，却被美国于1898年从西班牙手中“购买”菲律宾后所剥夺。随后，美国在20世纪之交发动了侵略与占领战争，对菲律宾实行殖民统治。为了巩固其帝国主义利益，美国帝国主义者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封建秩序，还进一步扭曲和改造这一制度，使其完全服务于自身的扩张野心。结果，半封建主义得以强化——外国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内封建势力相互交织，导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被商品经济所侵蚀、瓦解，最终彻底沦为依附于帝国主义利益的半商品经济体系。美国借此大肆掠夺殖民地的贸易与投资资源，从中攫取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包括黄金、红花梨木、糖、服装及其他半成品。

买办资产阶级源于那些成为外国资本代理人的精英地主家庭，他们在贸易、金融及商业活动中充当中介角色。美国帝国主义者既保留了大地主的土地垄断地位，又确保菲律宾经济服务于美国的经济与战略需求，从而将菲律宾经济纳入了美国资本的势力范围。

美国推动了所谓“[菲律宾化](#)”的殖民官僚体系，旨在拉拢当地精英，并培训他们接管殖民政府的管理。1907年，美国成立了[菲律宾议会](#)，以培养和造就一批能够代表新殖民国家行使治理职能的本地精英阶层。为此，美国派遣了超过一千名教师，建立公共教育体系，推广英语及“美国价值观”，力图塑造一支忠于美国的本土精英队伍。此外，美国还于1903年启动了“[奖学金生计划](#)”，资助菲律宾学生赴美深造；1905年创办了[菲律宾军事学院](#)，专门培养菲律宾宪兵队（后发展为菲律宾武装部队）的军官；1908年又成立了[菲律宾大学](#)，提供法律、公共管理、医学、工程、艺术与文学以及科学等多领域的专业培训。

1946年，美国授予菲律宾“独立”，但同时确保由美国培训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精英掌管官僚体系，使菲律宾沦为一个完全听命于依附于外国资本的统治阶层利益的傀儡共和国。此外，独立之初，美方强加了五项军事协议[4]，其中包括允许美军继续驻扎大规模军事基地；与此同时，不平等的经济协议则被强行推行，以延续有利于美国企业的贸易与投资政策，彻底阻碍了土地改革和国家工业化进程。美国还强制实施自由贸易政策，以及其他严重失衡的投资与贸易协定，使菲律宾农业出口不得不依赖美国市场，而工业及制成品却高度依赖美国进口。这种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不仅扼杀了本土工业的发展潜力，更进一步巩固了农村地区落后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结构，从根本上破坏了国家的自主发展道路。

西班牙征服者建立封建关系，而美国帝国主义统治下又叠加了资本主义结构，这一历史进程最终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地主阶级得以保留，成为殖民贸易的根基；与此同时，买办资产阶级应运而生，充当地方代理人或外国垄断资本的中间人。这些买办对发展民族工业毫无兴趣，他们仅从事外国商品的批发与零售业务，以及原材料或半成品的出口贸易，靠不平等的贸易和经济依附关系牟取暴利，同时充当外国垄断资本在菲律宾的子公司的本地管理者，负责将进口零部件组装而成的商品再出口。

官僚资本主义与新殖民主义国家的危机

何马同志（菲律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创始主席何塞·玛利亚·西松）曾这样概括菲律宾从直接殖民地到新殖民地转变的过程：“随着美国帝国主义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代价不断扩张其利益，殖民地时期的官僚已蜕变为官僚资本家。他们通过将政府视为一个庞大的私营企业，从中攫取巨额私人利润，从而成为资本家……这些人服务于买办式的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而后者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国内物质基础。然而，与上述两大剥削阶级不同，官僚资本家正是借助手中的政治权力来积累或扩大自己的财富。”[5]

美国帝国主义者菲律宾建立了一个傀儡或新殖民主义国家，旨在巩固大资产阶级买办和大地主的阶级统治，以服务于帝国主义利益。这些地方剥削阶级的统治，正是帝国主义势力在该国直接掌控的体现。这些阶级毫无独立性与民族特性，完全沦为美国帝国主义的附庸。

在美国帝国主义与大资产阶级买办和大地主并存的同时，还催生了一群官僚资本家。在菲律宾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这些官僚资本家并未完全作为新兴阶级出现，而更多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延伸或政治代理人。他们掌控着傀儡政权，制定法律、设计各项计划与政策，从而为大资产阶级买办和大地主巩固权力、进一步积累资本与财富提供了保护和支持。

总的来说，官僚资本家出身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既有传统的地主家庭，也有买办商人，还有军队中的等级制度，甚至包括通过选举或任命跻身权力核心的小资产阶级群体。即便是在那些自诩定期举行选举、拥有代议制机构的所谓“民主”共和国中，主导这些“民主”进程、掌控其治理机构的主要政党，实际上仍受当地统治阶级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幕后操控。

在菲律宾，官僚资本家以家族王朝的形式长期把持权力，家族成员及密友纷纷占据要职。各派系家族通过选举瓜分政治权力和国家特权，而这种竞争往往演变为暴力冲突——尤其当这些家族同时也是拥有私人武装、掌控地方军事与警察力量的地方军阀时。执政的家族凭借掌握的国家资源，大肆推行裙带政治，利用封建文化营造出一种氛围，使民众因曾获政府补贴或某种形式的国家援助而深感“欠”着政府恩情，这些援助往往被巧妙包装，并打着参选政客的名义发放。此外，他们还动用国家权力，通过多种手段操纵选举结果。过去15年中，自动化计票系统的引入，反而为系统性、大规模的选举舞弊提供了便利。

官僚资本家与美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代理人与客户的关系。作为回报，他们对美国帝国主义利益的忠诚——包括政治军事控制，以及市场自由化、自然资源准入等帝国主义贸易与投资——换来的则是财富、权力和政治庇护。

随着时间的推移，菲律宾新殖民主义国家的官僚们利用其高级公职所享有的特权与对国家资源的掌控权，大肆积累资本和财富。这些官僚资本家逐渐将其经营活动与大型买办资产阶级及大地主势力融为一体。正如卡·乔马所言，这种现象发展成为一种“资本主义形态——即最高级别的公职人员借助其掌握的政府权力、对政府机构和企业的控制权，以及公共领域内的公共资金和自然资源，与家族成员及私人部门中的亲信伙伴联手，共同推动自身的资本积累，而这些伙伴早已是成功的大型买办或渴望跻身于此行列的新兴买办。”[6]

贪污腐败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但并非其全部。除了贪腐之外，官僚资本主义更是一种系统性的积累方式，服务于整个傀儡统治阶级——这些统治者通过与帝国主义的结盟及依附关系来维持自身权力。他们利用国家政权，并非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或改善民众疾苦，而是为了掠夺公共财富、充实本阶级利益，并推行美国主导的经济政策。

新殖民主义国家的危机催生了有利于官僚资本主义阶层迅速崛起并形成独立阶级条件的局面。20世纪7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菲律宾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长期性危机。结果，统治阶级可用于分配和分享的经济资源日益减少，导致各派系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更加激烈。

1972年，危机促使马科斯通过实施戒严令，垄断了政治权力，并利用绝对权威接管了 rival 派系的商业与贸易活动，以谋取自身及其亲信资本家的利益。他收买了军方和警方

高层官员的忠诚，允许他们通过敲诈勒索以及与犯罪集团勾结的方式疯狂敛财。长达 14 年的戒严统治，为官僚资本主义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促使这些官僚资本家逐渐演变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成为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即菲律宾的大买办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层。其中最成功、最具实力的，正是那些同时兼具官僚资本家与买办地主双重身份的人物。

官僚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滋生的土壤。它们利用国家的武装力量及其他强制手段，肆意施暴与恐怖，以镇压一切形式的革命反抗，从而巩固帝国主义统治和反动阶级的专制统治。马科斯独裁统治时期，随着国家军队规模数倍扩张并全面推行军事统治，法西斯主义达到了顶峰。而自 1986 年以来的伪民主政府，尽管表面上仍保留选举、法院等民主形式，却日益加剧对民众的暴力镇压，其做法完全遵循了美国的反叛乱战略。

在 2020 年的一次采访中，何马同志指出，尽管菲律宾的官僚资本家最初只是大买办和大地主的政治代理人，但“他们已通过利用政府权力积累起强大的势力与财富，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阶级。这些家族因热衷于延续自身政治统治，进而进一步攫取私人资本和土地而声名狼藉。”

官僚资本主义的机制与运作方式

半殖民地的官僚资本主义是一种寄生性的阶级统治制度，它借助国家权力，通过屈从于帝国主义、攫取政治特权乃至公然掠夺，实现资本积累。在菲律宾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这种制度正是外国垄断资本与当地统治阶级剥削国家劳动力和资源的关键工具之一。它以各种形式的压迫，将广大民众置于奴役之下。正如卡·乔马所指出的，官僚资本主义就是统治阶级中嵌入国家机器的一小撮人，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经济利益的一种现象。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官僚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一些独特机制与运作方式：

将用于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的公共资金回扣及挪用，转入私人账户或空壳公司。

政府合同往往被授予亲信或家族企业，而采购、投标及监管流程则经常被操纵以谋取私利。其中，官方发展援助（ODA）成为腐败的重要渠道——尽管它被冠以“援助”之名，实则

常常沦为官僚资本家大肆敛财的源头。此外，基础设施项目要么被抬高价格，要么干脆偷工减料，远未达到应有的标准。

在马科斯的戒严统治期间，1972年至1980年——即马科斯政权最为鼎盛时期——菲律宾从帝国主义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额竟激增至四倍。然而，这一巨额资金却被该政权大量投入了毫无实际效益的“白象”型基础设施项目，以及价格虚高的能源和水坝建设，还有旨在美化法西斯独裁形象、耗资巨大的马尼拉大都会区建设工程中。其中许多项目甚至直接被授予给马科斯家族的亲信、空壳公司，或是由马科斯家族本人掌控的企业。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机构估算，在这段法西斯独裁统治期间，马科斯家族通过一个由170家虚假公司和离岸账户组成的庞大网络，共侵吞了约130亿至15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

历届政权无一例外地卷入了同样的勾当——大肆敛取回扣，并挪用公共资金，尤其通过公路、桥梁、铁路、电信等基础设施项目。每当新政权上台，便急于谈判新合同或重新协商旧合同，以确保新掌权的精英集团能分得丰厚的回扣。在杜特尔特执政期间（2016年至2022年），官僚资本家借助中国政府银行和企业资助的大坝、桥梁及其他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从政府合同中积累了巨额财富。而随着美国傀儡马科斯上台，其中一些合同已被重新谈判，并转手授予了美日银行。

自然资源、土地、公用事业及重点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与公共资产出售

官僚资本运作的另一个关键机制，便是自然资源、土地、公用事业及关键产业的自由化。这些官僚资本家充当外国资本的掮客与保护者，以牺牲国家财富和人民权益为代价，大肆攫取采矿特许权、伐木权以及农业出口区等利益。他们通过收取佣金、股份和贿赂，坐享帝国主义掠夺国家财富的暴利，从而迅速聚敛巨额财富。

例如，前总统诺伊诺伊·阿基诺三世积极推行公私合作模式（PPP），将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向跨国公司开放。这些被包装为改革措施的PPP项目，使外国企业得以在交通、水务、能源和电信等关乎国家主权的关键行业中参与合资经营——而这些行业恰恰是维护国家独立与安全的核心所在。阿基诺政府还大力倡导新自由主义政策，进一步放宽对采矿业和外资的管制，并颁布了第79号行政命令，削弱了当地民众对破坏性采矿活动的抵制力量，同时向帝国主义企业释放出菲律宾“欢迎投资”的明确信号。在他的执政期间，

外国及本地大型企业获得了大量特权，而菲律宾人民却不得不承受电价上涨、环境恶化以及被迫迁移的沉重代价。

在这些角色中，官僚资本家并非被动地允许剥削——他们反而积极策划、推动并精心设计这种剥削——通过改写法律、废除监管、谈判合同，以及镇压反对力量，以维护帝国主义利益。因此，他们的积累基础并非来自生产，而是取决于他们能否成为外国垄断资本可靠且高效的中间人。正是由于背叛国家利益、与帝国主义企业勾结，这些官僚资本家沦为外国掠夺活动的国内代理人。随着国家日益贫困，他们自身却愈发富足。

以“发展”项目为名的强占土地行为

土地掠夺是官僚资本主义运作中不可或缺的另一环节。他们利用国家权力，将土地征用或重新划拨，用于服务于帝国主义或买办利益的“开发”项目。官僚资本家通过掌控立法、城市规划及公共工程等手段，人为抬高地价，进而侵占政府和私人土地，迫使社区迁移，而这一过程往往与房地产寡头、买办企业以及外国资本直接勾结。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菲律宾的[维拉尔政治家族](#)。作为该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维拉尔家族起源于地主阶层，凭借战略性土地囤积和房地产开发积累了巨额财富。1992年，曼尼·维拉尔正式步入政坛，并从此巧妙地将政治生涯与财富扩张有机结合。更令人瞩目的是，当他的儿子马克·维拉尔在杜特尔特政府时期被任命为公共工程与公路部长后，家族的财富更是翻番，稳居《福布斯》菲律宾富豪榜榜首。

在他任职期间，数十亿比索的基础设施项目被投入关键区域——其中许多项目恰好与维拉尔集团旗下的房地产公司（如维斯塔土地和黄金布里亚）所拥有的土地相吻合，甚至穿过这些土地。这些由国家兴建的道路大幅推高了相关地区的土地价值，为该家族带来了意外之财。这正是官僚资本家如何利用自身地位，通过操控国家权力来巩固阶级利益的经典案例：他们借助国家力量实现自我财富积累，吸引外资，操纵政策，并进一步巩固其对土地与资源的精英式垄断地位。

维亚尔案生动地揭示了官僚资本家如何蜕变为强大的买办资产阶级，成为帝国主义资本的本地代理人。他们通过将国家权力与资本积累巧妙结合，从地方地主逐步演变为官僚资本

家，进而跻身菲律宾最大的买办资产阶级之列，同时始终牢牢掌控着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政治权力地位。

对国有企业的管控，以及政府控股的民营养老和保险基金，还有监管机构。

菲律宾的官僚资本家还通过掌控养老金基金来积累资本，例如政府服务保险系统（GSIS）、社会保险系统（SSS）、住房储蓄基金（Pag-IBIG）以及菲健康基金。这些养老金基金旨在为政府雇员和私营部门员工提供退休福利、低息住房贷款及医疗保险。

官僚资本家任命自己的代理人担任高管，并将这些机构运作为私人企业，从中攫取丰厚的薪酬、福利，以及对巨额资金的控制权。他们还系统性地利用自身影响力，操控这些基金的投资决策，将资金投向那些只惠及自己及其盟友的项目与企业，从而剥夺了养老金领取者的利益。据统计，数十亿比索因投资失败而付诸东流，而这些养老基金公司如今正试图通过加重本应受益人的负担来挽回损失。

官僚资本家还通过掌控菲律宾经济区管理局、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国家电力公司、菲律宾港务局、轻轨交通管理局等国有企业来积累财富。他们利用对这些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大肆攫取巨额利益：如将合同授予亲信企业、向特定公司提供优惠政策、在许可证发放过程中贪污受贿，或非法出售土地及其他公共资源，甚至挪用企业资源为个人谋取私利。

马科斯小儿子政权近日重启了“[马哈里卡基金](#)”，这是一支主权财富基金，预计规模达5500亿比索，资金将主要来自多个公共基金及国有银行的集中筹集。可以肯定的是，马科斯及其掌控该基金的官僚资本家代理人，必将通过受贿及其他形式的腐败手段聚敛财富、中饱私囊，尤其是那些获得优厚投资待遇的企业——其中包括已获丰厚合同与特许权的矿业公司。

官僚资本主义与犯罪活动的勾结

在菲律宾，官僚资本主义机制已与犯罪活动深度融合，进一步为资本积累创造了更多机会。其中，走私活动是官僚资本的最大来源之一——海关部门竟被退役及在职的军警官员所掌控。每当新政权上台，都会接管大米、糖、燃料、香烟以及各类商品的走私业务。随着进

口全面自由化政策的推行，这一现象更是愈演愈烈。这些势力甚至与当地控制进口和市场供应的贩毒集团勾结或为其提供庇护，通过操纵本地市场价格，攫取更大利润。

巨额资本还通过庇护毒品交易和非法赌博等非法活动而迅速积累。借助警方的严厉打击，官僚资本家得以掌控这些犯罪团伙，迫使它们屈服于自己的权威并缴纳“保护费”。这种敲诈勒索式的制度，使官僚资本家得以聚敛惊人财富，进而将这些财富投入各类商业项目、房地产开发及其他利润丰厚的领域。

“反叛乱”与国防合同

官僚资本主义的寄生现象并不仅限于文职官僚。实际上，官僚资本主义阶层中一个庞大而具有战略意义的组成部分，正是由军队和警察精英构成——这些将军与军官们通过国防合同、掌控国内安全预算以及外国军事援助等方式攫取巨额财富。其中，被美其名曰“战术信息”却长期未接受审计的“反叛乱”巨额预算，更是直接充实了军方将领和基层军官的腰包。更令人担忧的是，在美国推行的“全国家应对”反叛乱战略下，腐败现象进一步加剧：该战略将政府各机构全面纳入军警体系的管辖范围，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军事精英的权力与经济利益。

退休或任职后，他们会在交通、能源、和平谈判、土地改革等关键机构中担任文职职务，从而进一步巩固军方和警方在国家经济与政治管理中的地位。

这些只是菲律宾官僚资本家积累资本的几种最典型手段。在最为集中的形态下，官僚资本主义演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掌控着新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公共事业、关键产业、主权基金以及其他重要经济设施——这一切都与帝国主义结成伙伴关系，并为其服务。

在菲律宾等深陷新殖民主义体系的国家，最强大的官僚资本主义集团正是那些属于统治集团的势力。他们利用自身地位，不断扩张并加深其庞大的买办—地主利益。这些势力并未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完全依赖于外国垄断资本，成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同时，受帝国主义主导的半封建制度制约，他们无法自由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更无法独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总之，官僚资本主义通过国家掠夺、外国勾结、土地霸占、债务依赖以及军事化控制等手段运作，其最终目的是为帝国主义和当地统治阶级谋取利益。这是一种寄生性和反动性的资本积累方式，它使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同时剥夺了广大民众的权益，并将国家发展置于外来支配之下。

菲律宾占主导地位的买办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

菲律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由国内的大资产阶级所主导，这些资产阶级既包括买办阶层，也涵盖官僚阶层。他们利用国家权力，为帝国主义投资提供便利并从中牟利，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阶级本质。

菲律宾的大型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了一类通过寄生性地与外国垄断资本勾结而积累巨额财富的阶层，而非依靠工业创新或生产性劳动。这些经济霸主靠进口成品、出口原材料，并掌控着房地产、农业、能源、矿业、零售业，以及半加工或装配业务和金融业中的外资流向获利。他们居于核心地位，不断强化菲律宾经济落后且依附的特性——这种经济模式本就旨在服务于外国资本的需求，而非推动本国的可持续发展。

许多这些大型买办的前身是趁着转型‘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传统的地主阶层，他们利用从封建地租中榨取的资本，涉足商业与金融领域。然而，封建土地关系并未被废除，反而成为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循环的跳板——并非为了发展农村经济，而是进一步推动经济以帝国主义的条件融入全球市场。正是这一转型，催生了地主与买办的融合：原本根植于土地的旧财富，摇身一变，转化为与外资紧密相连的新财富。

大买办资产阶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必然竭力阻止可能削弱自身阶级特权或动摇帝国主义统治的工业发展。他们对投资钢铁、石化和机械制造等基础产业毫无兴趣。从传统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商业利益仍集中于原材料采掘业、进出口贸易、国内批发与零售业，以及交通运输、房地产等领域——这些领域大多服务于资源开采和贸易，而非面向国内消费的本土生产。“买办大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沆瀣一气，共同反对国家工业化和土地改革，联手抵制发展独立自主、富有活力的民族经济。”[8]

他们还从事附加值较低的本地加工或原材料出口的精加工，以及进口制造零部件的组装、检验和包装后转口出口——这些活动构成了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全球价值链”。此外，还有以信息为基础的服务业“阳光产业”，如 BPO[9]，但这些产业依然依赖于或受制于新殖民地之外的核心工业运作。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攻势的推动下，许多曾由国家所有、提供水、电、交通等公共服务的机构纷纷被私有化，并纳入以利润为导向的买办式经营体系中。因此，“服务业”作为工业生产的附属部分及买办企业开拓的新利基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

只要买办主导的经济仍处于非工业化状态（以农业为主，过度依赖资源型产业，并且“服务业”规模庞大），这一点在那些从传统农业国家脱胎而出的半封建经济体中尤为明显——这些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便与地主阶级紧密交织在一起，尤其是那些从事出口作物种植、原材料开采，以及房地产、建筑和旅游等服务性业务的大地主。事实上，这些大型买办资产阶级往往本身就是昔日的地主或其后代，他们通过投资于农产品出口、制造业、房地产开发及金融等领域，与跨国公司结成了利益同盟。如今，这类新型地主已不再单纯依靠租金剥削，而是转型为连接外国资本与国内农业市场的资本主义中间人，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半封建式的剥削模式。

在菲律宾，一些大型买办资产阶级势力经营着规模庞大的种植园，这些种植园往往仅配备最基本的机械化设备。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地主，单纯依靠佃农剥削获利，而是通过雇用大量受压榨性条件支配的雇佣工人，并辅以契约种植、土地租赁等半封建式的传统经营模式。这些买办地主正是跨国公司开展大规模农业综合企业、采矿业及伐木业活动的重要合作伙伴——尤其是在棉兰老岛的香蕉种植园，以及遍布全国的资源开采项目中。而这些跨国公司本身，也直接从土地租金中攫取巨额利润，通常借助长期的土地控制权，如租赁协议和合资企业，并在国家的支持下实现这一目标。最终的结果是：买办阶层与外国资本共同受益于新殖民统治下持续加剧的土地和劳动力的圈占与剥削。

最强大的买办——地主集团还能轻易分化出一支独立的官僚资本主义阶层，他们活跃于资金充裕的政府运作领域，如军民采购、臃肿的官僚机构，以及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无论如何，这些买办——地主——官僚集团牢牢掌控着经济财富的最大命脉，并在最高层享有强大的政治权力。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佐贝尔·德阿亚拉家族，其根源可追溯至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土地所有权。在美国殖民统治期间，他们将原本的地产成功转型为城市房地产资本；而如今，这一家族掌控着菲律宾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阿亚拉公司。此外，他们还收购了曾由国家控制、并于1997年实现私有化的公共事业机构——马尼拉水务公司[10]。这一收购行为正体现了买办逻辑：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动下，公共产品被商品化，同时通过建立外资合作关系以确保高额利润；然而，最终却导致民众不得不承受水价飞涨及服务质量低下的双重负担。

另一位重要的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恩里克·拉宗二世，凭借家族传承的资本与广泛的人脉，成功拓展了其航运及港口服务产业帝国。拉宗旗下的企业堪称典型的买办式运作模式：它们既为外国贸易和全球资本流动提供便利，又通过控制落后国家的战略性基础设施攫取高额租金。在菲律宾，拉宗家族已被指控导致沿海社区被迫迁移、劳工遭到压制，以及马尼拉港口区和棉兰老岛部分地区土地用途的转变。这些行为表面上服务于外国资本与物流网络的利益，实则加剧了当地民众的贫困与社会动荡。

科胡安科-阿基诺家族正是地主阶层如何通过掌控广袤土地并获取外资，逐步蜕变为大型资产阶级买办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经济崛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他们借助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及政府服务保险系统（GSIS）提供的贷款，成功收购了位于塔拉克省、占地6000公顷的庞大糖业庄园——路易西塔庄园。此后，在整个60至70年代，科胡安科家族依托以出口为导向的制糖产业，不断积累巨额财富。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家族将积累的财富转化为银行业、保险业、制造业以及房地产开发等领域的创业与扩张，并进行了大量投资。此外，他们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从1986年科拉松·阿基诺当选总统，到不到二十年后其子贝尼格诺·阿基诺三世继任——确保了精英阶层对土地的持续掌控，同时也继续为外国投资提供诱人的激励政策。然而，首任阿基诺政府推行的《全面农业改革计划》（CARP）却漏洞百出，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股票分配期权”（SDO）机制，这一漏洞使像科胡安戈家族这样的地主得以在规避真正土地重新分配的同时，继续牢牢掌控着哈西恩达·路易西塔庄园。这恰恰凸显了官僚资本主义、地主制与买办利益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它们相互交织，既延续了封建式的剥削模式，又灵活适应了全球资本的新需求。

在采掘行业（如伐木和采矿），像阿尔坎塔拉集团这样的买办家族通过与外资企业合作，大肆掠夺自然资源。这些活动迫使原住民社区流离失所，摧毁生态系统，并导致整个省份陷入军事化状态。

买办大资产阶级在掠夺帝国主义利益的同时，还通过瓜分国家财富、攫取地租与佣金，进一步加剧了民族财产的流失。他们还牢牢掌控着金融和银行业，使经济始终处于债务依赖的困境之中。作为外国垄断企业和银行机构的代理人，他们不仅促成贷款交易和资本流动，还从中收取高额佣金和手续费，坐享其成。这些买办大资产阶级非但不创造任何价值，反而依靠侨汇和投机性投资大发横财，将本国经济彻底沦为外国垄断资本主义势力的附庸。

此外，他们的影响力还延伸至媒体、学术界和政治话语领域。买办控制的媒体将帝国主义掠夺视为理所当然，丑化革命性反抗，并散布有关“进步”与“投资”的虚假论调。

大买办资产阶级并无发展本地生产力的动力，反而充当了帝国主义资本的把关者，通过依附于外部势力且落后的经济体系，从国内经济中攫取财富，以服务于外部强权和内部精英阶层。正如《菲律宾社会与革命》所总结的那样：“它[大买办资产阶级]是本国帝国主义统治最稳固的社会基础，同时对任何旨在争取民族独立与民主的运动都极度恐惧并充满敌意。”

三大统治阶级在农村延续着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同时强化了城市中的半殖民地依附状态。只有彻底摧毁买办与地主的勾结，铲除官僚资本主义的镇压国家机器，并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菲律宾广大民众才能真正摆脱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三大祸害的束缚。

新殖民统治的机制

美国帝国主义通过多种机制，尤其是施加或炫耀军事力量、进行政治干预与颠覆、实施经济打压以及扩大文化影响力，持续维持并巩固了其对半殖民地及傀儡国家的统治。无论这些国家处于文官统治之下，还是由军政府掌权，傀儡政权的本质始终如一：一种由买办式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官僚资本家主导的半殖民地国家——而这一切都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尽管这三大阶级在职能上各有不同，但它们在阶级利益上高度一致，并且共同依赖于

美国帝国主义的庇护与支持。正是这三者联手，构成了统治阶级联盟，继续推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严重阻碍了菲律宾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与民主发展。

这种在新殖民地中巩固的傀儡统治，其具体形式因各国的历史与现实条件而异。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后殖民国家，帝国主义势力甚至能制造出全新的精英阶层——官僚资本家——他们被赋予重任，代表帝国主义势力管理新殖民地的事务。一旦掌权，这些官僚资本家便通过援助、培训、意识形态扶持以及安全同盟等手段，受到美国帝国主义的精心培育。事实上，在特定条件下，官僚资本家甚至可能演变为一个由帝国主义直接塑造的独特阶级。

在上文第一部分中，我们已探讨了美国帝国主义如何培植并塑造了一整批菲律宾本土精英阶层，以代其管理新殖民主义国家。这些精英的培养还得到了美国奖学金及资助项目的进一步强化，而这些项目的资金来源既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私人机构，也涵盖各类公立学术与军事机构。通过这些项目，一支忠于美国、具备技术官僚特质的官僚队伍得以形成，并逐步确立了其意识形态倾向与专业技能体系。

在许多国家，美国帝国主义者曾支持右翼政权、政变及军事独裁统治，例如菲律宾（马科斯）、韩国（朴正熙）、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智利（皮诺切特）、尼加拉瓜（索莫萨）、阿根廷（比德拉）、伊朗（巴列维）以及其他众多国家。在菲律宾，美国不仅训练并资助该国军队，还确保其始终服务于自身战略利益的维护。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的政府因坚定捍卫民族主权而遭到强烈经济与政治压力，最终被迫妥协，甚至通过选举或暗杀等手段被取代，如 1961 年刚果的帕特里斯·卢蒙巴，以及 1987 年布基纳法索的托马斯·桑卡拉。

政府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受到帝国主义的严密控制。这些机构实际上充当了金融资本的工具。自 1979 年起，美国借助 IMF 实施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在其半殖民地国家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包括要求私有化公共事业与服务、放松行业管制、放宽贸易与投资法律，并削减政府在社会服务领域的支出。这些结构调整计划被作为贷款再融资的条件强行推行。通过这些措施，各国原本具有的民族主义或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将半殖民地经济体重新导向，以满足帝国主义的战略利益——使其沦为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供应地，以及过剩商品的倾销市场。

这种新自由主义倾向进一步将外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嵌入各国经济，并使国内政策屈从于帝国主义的指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项目为跨国公司大开方便之门，使其得以全面掌控土地、资源型产业、公共服务，甚至教育与医疗等领域。这些调整使落后经济体制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并巩固和扩张了官僚买办资本主义。

美国帝国主义还极力利用其联邦机构，尤其是国务院、五角大楼，以及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情报机构，还有数量众多、资金雄厚的非政府政策“智囊团”和各类机构与渠道，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全国民主基金会。这些机构共同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精准操控所谓傀儡国家及现有执政政权的控制中枢，无所不用其极地施展着帝国主义手册中的种种肮脏伎俩。而除此之外，美国在政治外交、军事、文化（包括媒体和教会）以及社会经济等领域，还掌握着更多隐形的控制杠杆。

美国奉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始终与各派统治阶级保持密切联系，无论其是否掌权。通过豢养“备选势力”，美国能够在傀儡政权沦为政治负担、滋生或鼓吹民族主义诉求时，迅速用其他亲美势力取而代之，从而确保自身利益不受威胁。

它还密切监控其傀儡政权，留意它们是否开始变得野心过大——比如当地统治精英中的一部分试图过度集中经济与政治权力，滋生民族主义倾向，或谋求从其帝国主义幕后主使手中争取更大自主权。这些行为极有可能破坏帝国主义构建的严密新殖民依赖结构。华盛顿及其他帝国主义中心深知，这些政权最终可能转投盟友，甚至玩“两面派”策略，同时与竞争对手的帝国主义势力结盟，以换取更有利的条件，或是巩固其国内霸权地位。因此，帝国主义者的“游戏手册”不仅包括经济控制和军事协议，更涵盖持续的政治监控与干预——从温和的外交手段和援助附加条件，到更为直接的胁迫手段，如制裁，甚至包括推翻政权的行动。

甚至老费迪南德·马科斯最终也被美国帝国主义所抛弃，因为他在权力与财富上的贪得无厌，已成为一种政治负担。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马科斯政权施加经济压力，尤其推动其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计划，其中包括增值税（VAT）。1983 年，马科斯下令暗杀其政敌贝尼格诺·阿基诺老先生——这位已从流亡地适时返回的领袖，此举进一步激化了民众的不满与反抗情绪。当马科斯迟迟不愿推行增值税时，IMF 便切断了本已极度短缺美元资金的金融渠道，导致 1984 年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加剧、货币大幅贬值，同时引发大规模民众不满。

然而，独裁者依然固守权力，而他的持续统治极有可能引发革命性动荡。为此，美国通过卢格尔参议员，于1986年迅速推动了一场选举。尽管马科斯在1986年仍声称击败了科里·阿基诺，但美国随即调整策略，暗中支持一场由军方与民间联合发动的起义，最终演变为著名的EDSA“人民力量”起义。最终，正是美国亲自安排了马科斯的离任——他搭乘美军飞机，被护送至马拉坎南宫，随后流亡夏威夷。随着20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加剧、民众不满情绪高涨，马科斯政权已无法继续服务于美国的帝国主义利益，因此被一个更“可靠”的代理人所取代。马科斯父子的下台，正是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并抛弃那些威胁到自身统治、可能引发更大规模革命性动荡的地方暴君的经典案例。

本质上，帝国主义对其傀儡国家及其统治政权的控制，可从政策制定的具体细节、资金使用，到关键官员和人事的任免，甚至延伸至决定选举结果、宪法进程以及幕后派系斗争的走向。在极端情况下，帝国主义的“游戏手册”甚至包括中情局的肮脏伎俩——通过暗杀、政变及直接军事干预等方式实现“政权更迭”。

在这种背景下，武装力量和警方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重要依托。许多将领在退役或经任命后，纷纷进入文官体系，掌管政府部门、国有企业或开发项目——这些领域逐渐演变为他们谋取私利、滋生腐败的渠道。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军事将领则以维护“秩序与安全”为名，主导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并借助国家暴力镇压反抗势力，从而巩固统治阶级的利益。正因如此，即便是在所谓的“文官”政府之下，军队依然牢牢掌控着官僚资本主义阶层的核心命脉。

统治阶级的政治奴性，根植于帝国主义统治体系的经济结构之中。他们并非出于广大民众的利益而执政，恰恰相反，他们的阶级生存依赖于服务于帝国主义及地主—资本家的利益。这种统治方式不断加剧剥削、贫困与依附的恶性循环，使帝国主义的枷锁牢牢套在菲律宾人民的颈项上，难以挣脱。

新殖民地固有的危机

菲律宾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注定了其将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菲律宾经济受制于外国垄断资本的需求，并因对这种资本的依赖而备受压制；同时，落后的土地关系也严重

束缚了经济发展。因此，菲律宾经济根本无法独立自主地发展。这个国家时常遭受剧烈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衰退。危机并非偶然现象——它早已成为这一制度的常态特征。

该国仍处于非工业化状态。国内既没有钢铁，也缺乏其他基础产业，无法自主生产关键的机械设备、工具以及实体经济所需的其他核心产品。目前，本地生产仅限于对原材料进行简单加工，或对进口零部件进行低附加值的半加工与组装。工业生产完全依附于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沦为后者国际装配线的延伸。这种模式并未与更广泛的本地经济实现有效融合，导致当地难以满足民众的大部分需求，只能主要依赖进口。而对进口的过度依赖，则进一步推高了物价，使民生负担日益加重。

该国的农业生产，尤其是水稻、玉米、椰子及其他供本地消费的农产品，规模较小，主要依赖家畜和手工农具。机械化程度有限，农业产量相对较低，且灌溉设施不足，收获后的加工与储存条件匮乏，政府补贴也十分有限。特别是大米领域的进口自由化，已导致农民遭受巨大损失[11]。与此同时，大片土地被用于种植香蕉和菠萝等出口作物。数十年来，名义上的土地改革计划实际上加剧了农民无地化的困境。更令人担忧的是，大量农田已被改作商业开发和房地产项目，致使数百万民众因土地被强占而被迫迁移。然而，地主家族依然牢牢掌控着广袤的土地资源，迫使农民陷入债务缠身与生活不稳定的恶性循环之中。

该国正面临普遍的失业问题，因为经济无法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来吸纳国内劳动力。更糟糕的是，帝国主义势力不断推动剥夺农民、渔民及普通民众的土地、生计和收入来源，使数以百万计本可积极投入生产的人被迫陷入闲置状态。

自马科斯老政权以来，劳务输出政策便已制度化，这正是国家未能发展本国工业、创造就业机会的鲜明体现。而这一政策的背后，更是源于反动政府对侨汇收入的过度重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每年都有超过 100 万菲律宾人背井离乡，远赴海外寻求工作机会。实际上，国家已沦为全球资本廉价雇佣菲律宾劳动力的中介角色。尽管外汇汇款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支撑着国内经济，但其代价却极为惨痛——家庭分离、移民工遭受虐待，以及劳动力系统性地被削弱技能化。

为了创造就业，统治阶级推行吸引外资投资的政策，然而这却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危机。他们放任垄断企业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源、攫取暴利，导致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遭到疯狂剥削，工人权益更是遭到系统性侵犯。与此同时，外国公司被授予采矿许可，并获得军事及准军

事力量的保护。这些活动迫使少数民族社区被迫迁移，使农村地区陷入军事化状态，同时污染河流与森林——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赚取出口收益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同时也为官僚资本主义阶层输送巨额回扣。

该国长期面临贸易失衡问题。它进口了大部分消费品和资本品，而出口的却主要是廉价原材料和半成品。为了弥补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缺口，该国不得不积累难以持续的外债。同时，依赖侨汇和外国投资来维持偿债能力，这使得经济格外脆弱，并受制于帝国主义金融机构。

这笔债务的负担已转嫁到人民身上。公共资金被挪用于偿债，而本应优先保障的社会服务支出却不得不紧缩开支。与此同时，民众还面临基本商品税负加重，以及公共服务和公用事业使用费上涨的双重压力。列宁曾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警告过这种现象，他指出：“少数垄断者对广大民众的压迫，将变得比以往沉重百倍，更加难以承受，令人无法忍受。”

这一切揭示了统治阶级无法解决自身制度的矛盾，反而使这些矛盾更加激化。列宁曾指出：“这正是资本主义在其最高历史发展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所特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无论是通货膨胀、能源动荡，还是农业衰退，趋势已十分明显：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正处于不可逆转的瓦解之中。如今，马科斯-杜特尔特这一权力轴心，正是这一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中所有危机根源特征交织共存的缩影。这两个家族的合法性，既源于法西斯主义的遗产，又依赖于对掠夺性财富的世袭掌控。他们联手加剧军事化，镇压异见，并通过倚赖外债、盲目推进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实施高压税收政策，竭力维系摇摇欲坠的统治秩序。无论谁坐上马拉坎南宫的宝座，统治阶级始终紧抓权力不放，不断强化帝国主义依附关系与半封建压迫机制。

在这种背景下，显而易见，危机无法在现有体制的框架内得到解决，而只能通过彻底推翻这一制度本身来化解。因此，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必须发起一场革命运动，其目标并非零敲碎打式的改革，而是彻底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秩序。

唯一的前进道路是人民民主革命。

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下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所引发的棘手危机，菲律宾人民早已找到唯一真正具有革命性的解决方案：人民民主革命。

正如马同志在《菲律宾社会与革命》中所阐述：“人民民主革命是解放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必由之路。这是一场全面的社会革命，旨在建立人民民主国家，并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这场革命的目标是彻底废除帝国主义及其地方代理人所施加的剥削与压迫，同时开启建设独立自主、富于进步性的民族经济的重任。”

这场革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旨在反对外国的统治与控制；同时，其内容是民主的，矛头直指国内为帝国主义充当帮凶的封建阶级和买办阶级。革命的战略是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人民战争，这一战略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进攻三个可能的阶段。在防御阶段，农村将成为武装斗争的主要战场，同时也是反封建、反法西斯的群众运动及根据地建设的核心区域；而城市则扮演次要但至关重要的角色，成为开展反法西斯与反帝合法斗争以及政治工作的主要阵地，为农村主战场提供有力支持。

由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已在全国各地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建立了政权机关。这些机关正是农村地区人民民主政府的雏形，目前正积极开展革命性土地改革，以及医疗卫生、教育和文化工作。作为菲律宾革命的主要武装力量，新人民军是摧毁反动国家武装力量的首要武器。

新人民军成立于1969年，当时几乎是从零起步，仅拥有几支威力强大的步枪和少量轻武器。与得到最大帝国主义势力支持的强大反动武装力量相比，新人民军至今仍是一支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的军队。然而，在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下，新人民军通过开展游击战，并发动一系列战术性攻势，逐步击溃敌方力量，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壮大。如今，新人民军已在菲律宾群岛各游击战区建立了多支红色战斗队伍，不断积累胜利成果，同时也因自身内部弱点以及敌人全面战略进攻而蒙受了一定损失。目前，新人民军正与菲律宾共产党一道，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决心将人民战争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在农村，革命性的群众运动正通过武装斗争这一首要任务，夺取政权；而在城市和城镇中心，合法的民主群众运动则发挥着不可或缺、相辅相成的作用。它通过群众性运动、宣传教育以及法律斗争，揭露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唤醒并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同时，这一运动还致力于团结最广泛的进步与民主力量，构建跨越各受压迫阶级和领域的统一战线。这些斗争紧密围绕着菲律宾社会的主要矛盾展开，并与农村地区的反封建、反法西斯和反帝运动相互呼应。正如卡·霍马所指出的，法律斗争“是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来运用的，而非取代革命斗争”。

城市中的群众运动必须服务于壮大、支持和巩固农村革命，推动群众基础建设，并全面促进武装革命的深入发展。工人阶级和城市各阶层应与无地、贫困的农民团结一致，深刻认识到广大农民是人民战争的主力军。因此，合法的民主运动不应仅仅作为满足各阶层诉求的工具，而更应成为一种唤醒民众意识的力量，引导人们彻底认清自身被剥削的处境，以及受傀儡政权压迫的根源。它必须揭穿改良主义的幻象，揭示自由民主的局限性，并在当前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所引发的危机面前，明确指出革命变革的必要性。

它在培养革命干部方面发挥着战略性作用。这里不仅锻炼组织者，还帮助他们深化理论认识，同时检验积极分子的政治决心。正是在这场运动中，一批批革命者脱颖而出，毅然投身农村，加入武装斗争的行列。其中，许多最坚定、最具战斗力的红色将领和游击战士，最初都来自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他们早年曾以学生 activists、社区组织者、工会成员、教会工作者或文化工作者的身份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菲律宾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人民民主革命，是旨在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基础的两步走革命进程中的第一阶段。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后，革命将从民主任务转向社会主义任务。届时，旧的剥削阶级将被彻底消灭，同时确保必要的资产阶级改革不会导致资产阶级的巩固，从而使革命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革命将全面完成土地分配给耕作者，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坚实基础。此外，必须启动民族工业化进程，以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打破对帝国主义资本与商品的依赖，并为广大人民创造就业机会。经济的制高点将由人民民主政权牢牢掌控，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进而推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最终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菲律宾共产党在过去 56 年中始终不渝地领导新人民军和各革命力量，开展革命武装斗争，推动人民民主革命，反对最强大帝国主义势力的当地傀儡政权。这一时期，尤其是自

1976 年以来，正值中国社会主义遭遇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整体陷入退潮。在菲律宾开展人民战争，正是菲律宾共产党为全球受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而作出的贡献。

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并非孤立的过程，而是世界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与当地反动势力联合力量斗争的一部分。

他们必须勇敢而全面地直面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全貌——揭露其根源，即帝国主义的统治、买办阶级的背叛、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掠夺。前进的道路既不平坦，也非短暂，但这是通往真正自由与解放的唯一途径。

让无产阶级和各新殖民地人民肩负起本国革命的历史重任。让我们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深化理论根基，高举旗帜、手握武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奋勇前进，迎接胜利的到来！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万岁！

人民民主革命万岁！

[1]: 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第四届新殖民地买办与官僚资本主义国际理论会议上的主题演讲

[2]: 该制度是西班牙王室建立的一种殖民封建安排，即授予西班牙恩科米恩德罗对特定领土的控制权，并有权从当地居民手中索取贡赋、劳役及农产品，以换取他们承诺为当地民众提供保护与宗教教导，从而实现西班牙殖民势力的渗透与掌控。

[3]: 庄园制是一种土地占有制度，它继承并扩展了恩科米 enda 制度，将大片农业用地集中控制在宗教团体、西班牙殖民官员以及当地合作势力（即“伊鲁斯特拉多”和“普林西帕利亚”阶层）手中。这一制度推动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作物种植，吸引了外国商业资本的介入，标志着半封建生产关系的兴起。

[4]: 其中包括 1947 年的《军事基地协定》（MBA），该协定允许美国在菲律宾全境维持并运营至少 23 个军事基地；1947 年签订的《军事援助协定》以及随之成立的美菲联合军事顾问团（JUSMAG），确保了美国持续影响和控制菲律宾军队的发展，使其始终服务于美国利益；1953 年签署的《互助防务援助协定》则通过正式化美国的军事援助、武器转让及培训，进一步巩固了菲律宾对美国的军事依赖；此外，1951 年生效的《互助防御条约》更为美国继续驻军该国提供了法律保障。

[5]: 阿马多·格雷罗，《菲律宾社会与革命》，“菲律宾人民的基本问题、官僚资本主义及其内涵”

[6]: 菲律宾人民的基本问题——关于《菲律宾社会与革命》第二章的初步问答，由 Anakbayan-Europa 主办的 ND 在线学校网络研讨会系列，何塞·玛利亚·西松回答安赫洛·戈迪诺提问，2020 年 6 月 21 日 [<https://www.prismm.net/2020/06/21/sison-qa-psr2-basic-problems/>]

[7]: 论人民民主革命：何塞·马利亚·西松访谈，<https://www.redspark.nu/peoples-war/on-the-peoples-democratic-revolution-an-interview-with-jose-maria-sison/>

[8]: 菲律宾社会与革命

[9]: 业务流程外包（BPOs）是指将企业非核心业务运营，如客户服务、技术支持和后台职能等，从帝国主义国家的企业转移到菲律宾等低工资、劳动力充裕的国家。

[10]: 马尼拉水务公司现由大资产阶级买办恩里克·拉宗所有，他于 2024 年通过其投资公司 Trident Water，以 129 亿比索的价格收购了阿亚拉家族持有的全部股份。

[11]: 例如，菲律宾的稻农们在 2019 年受《稻米自由化法》（RA 11203）的严重影响。该法案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下，取消了对稻米进口的定量限制。结果，廉价的进口大米大量涌入市场，导致稻谷的农场出厂价暴跌至每公斤仅 10 至 12 比索（约合 0.17 至 0.21 美元），远低于每公斤 21 比索（约合 0.37 美元）的平均生产成本。据报告，自 2019 年至

2022 年，这一政策使农民损失了超过 900 亿比索的收入。许多小农户难以恢复元气，甚至有部分人彻底放弃了水稻种植。